

# 城市里的迷失与寻找

## ——山西“新锐作家”城市叙事简论

阎秋霞

城市在中国的发展尽管已百年有余,然而“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中国”<sup>(1)</sup>的特征时至今日依然如故,城市叙事也从未与乡土叙事平分文学格局,尤其是作为内陆省份的山西,关于城市的叙事一直是其薄弱之处,焦虑如影随形。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以60后、70后、80后为创作主体的“新锐作家”日渐成熟,关于城市的书写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状况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身处内陆的作家们如何面对城市文化?其深厚的乡村文化背景给其城市叙事带来怎样的影响?今日面临怎样的挑战,当有怎样的出路,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

如果考查山西新锐作家笔下城市叙事的本质,可以概括为“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关于身份焦虑、生存焦虑与精神焦虑的故事。

### 一、身份焦虑

以李骏虎、杨遥等为代表的这批新锐作家几乎是清一色的“本土”出身,人生经历也大致相似:出生在贫困、偏僻、落后的乡村或者小城镇,通过读书,改变了农民的身份,毕业之后大多重回原籍,继续在底层挣扎,但在落寞的日子里,文学的种子却在悄悄地发芽,倔强地生长,终于在破土而出,长成一颗幼苗的时候,被慧眼识珠的文学前辈或者文化单位所发现,文学终于为他们带来了命

运的转变。杨遥说:“我由于一直读书,稍微也有点运气,走了一条和别人相比有些不同的路。……一路上磕磕碰碰,有过很多艰难曲折。每次当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一次新的选择的时候,没有一次和我的家人商量过,因为他们都是农民,除了认识土地、庄稼和自己周围的那几个人之外,帮不上我什么实质性的忙。”<sup>(2)</sup>这不仅是杨遥一个人的经历,更是这个群体共通的写照。对这些来自于底层,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身生存环境的作家来说,“孙少平式”的奋斗史并不陌生,用“城乡交叉地带”来概括其文化身份似乎也更为准确。正是由于这种浓厚的农耕文明的精神背景,使他们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构建在城与乡基础上的两套精神体系总是互为参照,其中,强烈的乡土自卑情结使他们的城市叙事充满了惶恐、忧虑、不安、难被认同的身份焦虑。

杨遥的小说《你到底在巴黎待过没有》是一部表现典型身份焦虑病症的作品。主人公阿累去巴黎当了一个理发店的学徒,春去秋来,过了好多年的阿累终于熬到了独立开店。可自由了的阿累在“吞钱的怪兽”巴黎只有拼命干活才能维持生活的各种开销,即便是数千个日夜的“城市生活”却仅有的、能够记起的七天,阿累也有些模糊不清,以至于追问自己到底在巴黎待过没有?阿累只是千千万万个城市边缘人的符号,他的无助、压抑、劳作、漂泊是所有乡下人在城里的感觉,那种浮萍般

失根的惶然、仰望万家灯火却没有一盏属于自己的凄凉以及无话凄凉的孤独,被阿累这个形象诠释得如此充满寓意。再如《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是那么疲惫》写了一个颇具荒诞色彩的故事:元明的工作生活一团糟,被借调到城市的一个单位两年多始终无法解决关系问题,而家庭又面临危机,元明在终于下定决心离开那个鬼地方的时候才发现“塞满柜子的资料和桌子上多得快放不下的东西中,只有几本书和三四张明信片是自己的,这就是两年多来在这个城市这个单位的收获。”<sup>(3)</sup>元明就像童话中的骆驼一样,疲累终于让他丧失了生活的希望,一个人关系档案止住了他进入城市的通道。

手指的《小县城》中胜利为了进入城里人的视野,为了讨好小女生,竟然去商场偷各种东西,只为得到别人的一点羡慕,然后等有一天去了那个瘦女孩家时,“他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他一下就看自己皱巴巴的衣服,黑漆漆的双手,另外一个自己像被石头砸中的玻璃似的,一下子碎裂开来。”<sup>(4)</sup>强烈的自卑让胜利无地自容。在这个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建新在九岁时就对小县城充满了向往,因为一次不期而至的雨天,他被滞留在县城的旅馆几天,而这短短的几天竟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只是成年之后的建新的这种快乐并不被别人理解,包括他的妻子。在城里过着四平八稳日子拮据的建新再也没有了九岁时的快乐,于是他回到县城住到最豪华的旅馆,约了几个混得不怎样的同学,在对方的局促不安受宠若惊中,建新用自己编造的神话满足了自己的虚荣,他终于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自己可怜的“尊严”。由此可见城市所给予建新、胜利的除了生活方式、物质层面的自卑之外,始终有一种无法得到城市认可的身份危机,他们永远都只是城市的边缘人。《寻找建新》可谓是《小县城》的姊妹篇,从乡下、小县城来到城市的“我们”为什么要寻找建新呢?除了建新曾经是我们的老师,行侠仗义,为我们打抱不平,和我们一起赌博疯玩,是我们的主心骨之外,“我们需要一个为我们做主的人,带领我们的人,他有勇往直前的勇气,他敢于打开麦当劳、夜总会的玻璃门,他敢于和每个擦肩而过穿着光鲜的人对视,就好像眼睛里有一双坚挺的拳头,他还敢于在名牌专卖店里一件接一件地试衣服。当然,还有一点,

当他抬起胳膊拦出租车的时候,动作是那么自然,他能让我们安心下来。”“我们”只是需要找个人一起壮胆取暖,走进城市的深处。

这些乡下人向着城市走来,然而步履维艰、卑怯迷茫,一切源于模糊的文化身份。

## 二、生存焦虑

1990年代以来,在中国城市迅猛发展中,对物质、欲望的书写是与之匹配的主流倾向,其中性、金钱是该类型文学的核心元素,文本在“张扬人性”的旗帜下成了欲望宣泄或和释放的土壤,依靠大胆与粗俗的本能化叙事来迎合欲望时代的窥视癖好,诸如世纪之交“美女作家”们笔下的夜店、咖啡、吸毒、摇头丸、开放的性观念等是内陆区域的作家难以理解亦难以接受的,即便如写出了《废都》的贾平凹,当年“美女作家”争议四起时,还专门去上海做社会调研,以期了解这种欲望叙事的城市背景。正因为内陆的封闭性、保守性,城市文明的影响也呈现对应的滞后性,而缺乏城市发展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基因,对城市的书写就既不会出现矛盾全景式的“宏观叙述”,也不会有新感觉派笔下光怪陆离的畸形颓废、美女作家们大胆赤裸的欲望展览,既不可能有张爱玲华丽与世俗的传奇、王安忆从容与大气的怀旧,也不可能王朔解构与嘲讽的无畏,城市对于内陆的作家而言陌生而充满了诱惑,他们背井离乡,逃离土地,怀着对现代生活的向往,来到这里寻梦,然而“蚁族”们深刻的物质贫困、居无定所的漂泊又时时啃噬着敏感的心灵。因此,除了身份焦虑之外,生存焦虑首当其冲。

对于来自乡村的山西新锐作家们而言,房子、车子、票子无一不像一座座大山,直接胁迫着他们的生存空间。王保忠的《爱情算什么》里向春的爱情在房子这一刚性需求面前什么都不是;《心爱的儿子》中的婆婆被儿女接到了城里,但是儿子的病不仅使生意无以为继,还要变卖首饰甚至贱卖老房偿还看病欠下的债务;张乐朋的《买房记》老倪与妻子省吃俭用,半辈子的积蓄也仅够首付,为了享受一点优惠,不惜屈尊向自己曾经的高才生的男朋友求助;孙频《月煞》中的刘水莲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可怜的孩子,仅仅依靠奶奶摆摊糊

口,为了上大学的学费,挨家向当初强暴了母亲、可能是生父的男人“讨债”;《同屋记》中的张柳六年与人合租的生涯里充满了各种的心酸,一次次地换房子换租客,一次次相亲,莫不都是因为口袋里少的可怜的钞票,她只想为自己找到一个立足之地获得心安;《血镯》中的刘青燕靠残疾的母亲在街上卖石头饼得以复习并考上大学,然而,上大学的费用无异于天文数字,为此,母亲竟刨开了祖坟,变卖了姥姥的陪葬物——一副血镯来供她完成学业。杨遥的小说《雁门关》写得平静而沉重,“雁门关”是历史的见证者,文化的承载者,也是“我”辛酸生活的一个心结。结婚时就承诺要带妻子去看雁门关,但是几年过去,孩子都出生了,只因为生活拮据,只为了等到一辆顺车节省几块钱的路费,使近在咫尺的雁门关之行竟然迟迟不能兑现。雁门关,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却成了可望不可即的一个奢望。闫文盛的《逆光像》中的夫妻也为房所困,因为交不起房租被迫在雨天搬家;《掌上的星光》里小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竟然操起“婚托”的职业;手指的《在大街上狂奔而过》中的我、东方等打工的收入连房租、吃饭都成了问题,而骑自行车在深夜的街头狂奔成了他们释放压力的最好方法;“我们为什么没有老婆”?原因只是因为贫瘠。总之,他们的城市叙事从选材而言,不外乎都是关于乡下人在城市的种种遭遇:爱情、房子、车子、工作等关乎生存本身压力的故事,“某些年月里,困窘会成为挣扎的底线”。<sup>(6)</sup>的确,对于初到城市的这些“乡下人”,举目四望,城市的一切繁华不仅与自己无关,而且为了生存本身的衣食住行,受尽种种冷酷、混乱、虚无、疏离等的心灵折磨,这种物质的压迫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社会中正常的伦理秩序,诸如情谊与爱的现实性、爱情与性的分裂性、道德与良知的沦丧、是非不分的模糊价值观等等,都给这些携带古老传统、乡村文明中亲善和的记忆的70后、80后带来了深深的痛苦。

不过,他们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写实小说作家们“零度情感”的创作态度显然不同,后者在叙事中是尽量地隐藏自己的判断,不愿意再被人归于“知识启蒙者”的行列,池莉、刘震云等为代表的作家更是以放弃知识分子历来俯视的姿态回到民众中为追求目标的,即所谓“视点下沉”,把

“为老百姓的写作”高尚放逐为“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谦卑,对生存的困窘、无奈更多表现了其理解的宽厚、认同的包容。而山西的新锐作家们尽管在文本中也是对日常经验的复现式呈现,但是小人物微弱的呼吁和反抗依稀可辨,他们面对生存的压迫,不仅写出了沉浮在城市里的乡下人挣扎的艰难,而且传递出了不妥协的姿态,他们的叙事从来都没有放弃“叙事者”寻找、抵抗的努力,在充满生存焦虑的叙事中,更多是关于理想的不懈追寻和精神的自我拯救。

### 三、精神焦虑

一度时期以来,作家在作品中刻意“规避”自己的价值立场似乎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法则,而文学也从“启蒙现代性”进入到“审美现代性”。正如一些学者认识到“审美现代性则全力代表着现代主义的反叛、不确定、混乱和碎片化,是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新传统主义的全面颠覆”,<sup>(6)</sup>在这个颠覆的过程中,文艺审美中本应并重的真善美三要素更加突出“真”的力量,作家们争相挖掘“现实一种”的冷酷、无情、阴暗以及潜意识层面的人性之恶,自己却躲在文学帷幕之后冷眼旁观,毫无疑问,这种叙事者的“隐身术”,“曾经红极一时的‘作者已死’‘作者退场’理论在现今的语境之下逐渐导致了文化价值的虚空”。<sup>(7)</sup>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中“下海为商”与“退而结网”的分化直接导致了“广场退场”的荒凉,知识分子的声音在当今社会早已被疯狂的娱乐化掩盖,正是基于这种理想主义稀缺的背景,山西新锐作家群笔下对理想的寻找、对精神的焦虑才彰显了不寻常的意义。

这批年轻的作家在他们的城市叙事中一边诅咒着、牢骚着、埋怨着、焦灼着来自于身份、生存带来的种种压力,一边又在抗拒着、反抗着、挣扎着、寻找着精神的出路,无论他们采用了多少元叙事、象征叙事、心理叙事、狂欢叙事等现代叙事的技巧,但贯穿文本的却始终有一条明晰的理想之光。如李骏虎,早年是因《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等城市小说而蜚声文坛,并且依靠这部分作品获得2009年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与他后来的乡土小说相比,这组作品也许缺乏沉淀

的冷静和精心修剪的圆润,但也因此更具有青春的生动与激情,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来感知城市的温度触摸城市的喜怒哀乐,反映了城市里“乡下人”的精神成长。《奋斗期的爱情》主人公李乐其实就是作者的化身,一个年轻人刚毕业进入社会,对前程和爱情都充满热望,但是对触手可及的爱情每次都在关键时刻落荒而逃,而“我之所以能‘守身如玉地保持住纯洁’,并不是对人性压迫下的爱情的厌恶和拒绝,——相反,我很愿意沉迷于世俗的幸福,只是因为我有理想,并且看到世俗的幸福可能扼杀我的理想,因此才不得不拒绝。”<sup>⑥</sup>同样的价值观在《公司春秋》与《婚姻之痒》都有所体现。前者写一个人进入城市,开始发现社会的复杂和人心的叵测之后的精神反应,小说弥漫着一种荒谬、喧闹、陌生的氛围,反映出一个乡下人进入到城市的核心之后,对原来的传统道德观念的彻底颠覆而导致的精神焦虑,在周围所有人都为利益而疯狂相互陷害时,唯有“我”保持了自己原本的品质。而《婚姻之痒》虽然抛弃了前面以理想主义对抗现实的方式,但不惜违背网上众多跟读者的希望,充当了一个道德审判的法官,让马小波为自己的出轨和背叛受到沉重的道德谴责。李来兵的《掩盖》因为“我”不愿意在我的小说里加入“人们喜爱的元素”,比如说性,比如说凶杀,所以我的作品无法得到“市场”的认可。梦中的“我”却通过两个女人的艳遇、性爱得到了虚荣心的满足和自信,完成了走向“市场化”的仪式。“我”是坚守小说的纯粹,就像自己拒绝小姐的服务等待真正的读者来理解我接纳我,还是用梦里的意淫来屈从于市场对于性的需求?就这样,作者“在人格精神的一系列自我拷问、自我戕害、自我割裂后,完成自我救赎和实现自我烛照。”<sup>⑦</sup>梦醒之后,“我”再度回到了自己纯粹的文学世界。

杨遥的《表哥和一次青岛旅行》中“我”的生活拮据困顿,对表哥的求助又无能为力,但是为了一次海边的旅行,宁可花掉家里所有的积蓄,宁可一路买站票也要完成看海的心愿,因为那里有梦之所在;《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中的“我”为了被这个城市接纳,一再放低标准委曲求全,但总是被“北京户口”而拒之千里,在终于找到一份推销水的工作而且前景正好的时候,“我”离开了,因为“我喜欢一种自由的生活,且和文学有关。我觉得

自己就是诗人兰波笔下的总是‘生活在别处’的那种人,我的肉体需要漂泊,我的精神需要流浪,我认为‘长有翅膀的人总是渴望飞翔的。’”<sup>⑧</sup>

闫文盛的《痴人妄想录》是他对小说观念、生活观念的一次集中的“自白”。小说以“我”的视角讲述了两个人的命运,一个L,一个林。他们原本都是有大志有理想的人,但L经过岁月的修剪与磨砺,渐渐地堕落蜕变成了一个自私、暴虐的人;林则在无法寻找到诗意的世界选择了逃亡,而我,其实是两者的混合体,既有L遁入现实、做了世俗逃兵的无奈,也有林对于文学追求的纯粹与坚守。只是不同于林的悲观绝望,“我”在世俗的大地上依然在追求诗意的生存方式,并尽可能地保持十多年前对文学的喜爱,在罗伯·格里耶、马尔克斯这些伟大作家的故事中寻找自我救赎的力量。作者在凡俗人世努力抗争和拒绝的一种姿态,借用文学的声音,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心灵对话。“印证岁月的孤苦。它是我自己的家国梦。”闫文盛如此表述。事实上,这不仅是闫文盛的孤苦岁月,也是众多热爱文学然而又不得不在这个被金钱完全控制的日常生活里辗转腾挪的写作者的惶惑、愤怒、抗争与无奈的心声。

于是我们看到,在山西新锐作家的叙事中,城市尽管也呈现出一派荒诞的景象,主人公对这种时代所赋予的病症有愤怒有迷茫,但更多的是抗争,具有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勇力和自信,比如爱情,李骏虎的《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中的性、欲望等大多只是主人公在追求理想过程中与之对抗的一个道具;王保忠的《爱情算什么》写的是无房不婚的时代爱情的物质化危机,但结尾还不忘让小两口一起开店畅想未来;李来兵、杨遥、闫文盛等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对“诗意栖居”的向往等,都说明他们精神焦虑的本质其实充满了夸父逐日的悲壮与坚守。

综上所述,这些“迷失在城市里的新锐作家”,泥土的芳香尚未散尽,植根于乡村文化的记忆还没有完全被城市改造。因此,他们对于城市的触摸、感知也只停留在初期阶段,当然,这也是中国作家普遍存在的城市文化基因的匮乏症,只是对于山西的新锐作家而言更为严重一些。值得注意的是,80后的手指、孙频等作家尽管最近几年的创作获得了文坛的关注,但也存在80后们普遍具

有的问题。例如孙频的小说虽然超越了80后文学中常见的“青春困惑”“成长烦恼”，上升到了对多元混杂的价值体系中“人与物”之关系的思考，对人自身困境的发现，但是她的作品也充满了尖锐的、偏执的疼痛，过于追求对黑暗的感知，缺乏60后、70后作家建构理想品格的力量，如最近的小说《假面》就延续了早期作品中一贯的写作风格，对“性本恶”主题的深入开掘与勘探，色调阴郁、节奏低沉，犹如开放在荒原上的罂粟花，魅惑、妖冶、缠绵而又邪恶，充满了糜败颓唐；手指的《去张城》，与王保忠的同名小说相比，王保忠的张城是少年“北大”心中的神圣所在，因为那里有他精神的领袖——一个作家，他悄悄离家去张城的目的是为寻找自己的文学之梦。而手指笔下的“我”却漫无目的、百无聊赖，面对未来的生活茫然无措，小说中弥漫了一种不确定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情境。诚如他所言“我小说中的‘我’其实就是我，故事不是我，但是他对世界的看法，他所遭受的这个世界的压力，都是我自己的。”<sup>(11)</sup>如何从“我经验”的局限走向“他世界”的开阔，也是这批作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关于城市的故事刚刚开始，这群山西的新锐作家才掀开城市文化的一个衣角……

#### 注释：

(1)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 / 农村题材 / 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杨遥：《我们的路》，见其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fb3010101efof.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fb3010101efof.html)。

(3)杨遥：《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是那么疲惫》，《知觉》2012年五月号。

(4)手指《小县城》，《山西文学》2012年第6期。

(5)闫文盛：《散落的日常》，《百花洲》2010年第1期。

(6)洪治纲：《现代性的追问与当代先锋的崛起——重审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之一》，《南方文坛》2005年第4期。

(7)《先锋小说与文学未来的发展可能性》，《文汇报》2007年6月24日。

(8)李骏虎：《奋斗期的爱情》，[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0a22f10100gf6v.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0a22f10100gf6v.html)。

(9)李来兵：《与小说相遇——我的谢幕词》，《黄河》2005年第2期。

(10)杨遥：《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http://barb.sznews.com/html/2009-06/07/content\\_651765.html](http://barb.sznews.com/html/2009-06/07/content_651765.html)。

(11)《“你们”的世界——青年作家谈话录》，《大家》2009年第1期。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孟春蕊)